

第一篇 改革与发展

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

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民间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行为

中国的西岸开发与南下战略

第二篇 国际问题

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

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

WTO原则与中国农业问题

第三篇 经济周期与形势分析

中国经济略有复苏迹象，启动经济还需深化改革

宏观经济波动之下的改革与发展

199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分析

建国以来的经济周期及其相关调控政策分析

危机论

我们到底 要什么

“三农”问题专家

CCTV 2003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温铁军 著

出版社

温铁军
著

“三农”问题专家
CCTV 2003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我们到底
要什么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到底要什么? /温铁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

ISBN 7-5080-3467-8

I. 我… II. 温… III. 国情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301 号

我们到底要什么?

温铁军 著

策 划: 刘海英 李雪飞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开

字 数: 180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经济管理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有11年的“工农兵”和11年的“农村试验区”经历;因性喜“周游列国”,长期坚持“用脚做学问”,经100位著名学者和记者投票推举为2003年度“最具影响力”的CCTV中国十大经济人物之一,是其中惟一的学者。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担任过多项国家课题的主持人,从事过联合国、欧盟、APEC/PECC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项目,20年来已在近40个国家进行过调研和交流,近年来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他不仅以“三农”问题研究见长,而且是一位实践者。2002年7月他和同事们创刊了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次年7月又应农民要求在河北定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他自称,这些都只不过是继承上个世纪先贤思想的“改良主义”做法。

主要研究方向:国情与增长、乡镇企业与城镇化、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认识与实践的对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等。



我们到底要什么?

序 言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如何认识“全球化”问题讨论多多,并且在决策上亦有所反映。从报刊上可以知道,世纪之交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大趋势:全球化、跨国公司、科技进步,并认为这些趋势不可逆。可见,我们基本上已经摸准了、接受了西方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新世纪开端,中国已经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有些提法特别需要重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同。这两个概念应该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指世界范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应该包容任何一个国家;后者则意味着世界按照某种制度和标准被整合进一个体系。很多人都以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就得按照美国主导的方向被整合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已经别无选择,现在领导人决策是“打左灯,向右转”,实际上搞的也是全盘美国化。这种看法实在大谬不然。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还从来没有承诺过中国要纳入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尽管中国在加入 WTO 的谈判中做了一些让步来换得经济“全球化”的入场券。

即使排除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从中国的国情制约来说,我们也没有追求美国式现代化的条件。中国不可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目标。这个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可思议:难道要让我们中国人放弃追求现代化的希望吗?

对于中国这样世界上惟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现在的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进入 21 世纪,节奏快得连世纪末这一年都想略去不计了,因此

• 本文原载《天涯》杂志 2004 年第 4 期。

似乎没有人需要反省 20 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思想历程。也许因为我近年来突然从繁忙转为“赋闲”，所以还有时间停留在世纪末的研究和思考之中。一百年来，很多事情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们不妨先从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和当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两次都提出过“批孔”的口号。

一、在两次“批孔”中认同西方符号体系

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在世纪之初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自己的语言规范，彻底地照搬了英语语法这种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而且还开始从“师从苏俄”中找到了革命道路。

那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殿”，是在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之下，迫于内忧外患，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认为传统文化制约发展，要科学要民主，就必然彻底要与儒学决裂。那时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后来又改称为与当今“全球化”提法颇为相似的“充分世界化”）的口号，这与清朝统治阶级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但 21 世纪再看那个提法却是幼稚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一方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就中国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言,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以群体为本的,是中国特色的原始灌溉农业文明这种必须以群体生产为基因的社会的文化表现。孔夫子的“仁学”强调“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论强调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个体为基因的文化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狩猎和采集文明,那种生存方式可以突出个体。这与中国自“神农尝百草”就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必须共同使用黄河水系灌溉,同时又得联合起来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后来西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是海盗掠夺、“圈地运动”和殖民战争。所谓“开发新大陆”,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杀光,掠夺占有别人的资源。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争夺开发海洋资源、南北极资源;然后是太空、外太空资源。

如果说,西方在工业化期间只是以传统的手段争夺传统的空间的话,那么,近代新增加的手段则是争夺符号资源,由传统的争夺物化资源转化为控制符号资源。有的学者指出,广义的符号资源包括所有在人类信息交换中形成的规则和软件体系,包括所有的标准,比如 ISO 质量认证体系和相应的制度体系等。也有的学者认为,符号体系包括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符号体系的控制从人类开拓非物质资源的时候进入到空间体系、高科技体系乃至话语体系。还有的人认为,当前关于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有利于发达国家,计算机软件的所有符号系统也是由西方控制的。各种对发展中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制裁和引起的争端表明,符号的发明权、制度的创制权和体系的控制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霸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

方思想和规则。但从客观上看,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机会对同样来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开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战争年代在血的教训中对“本本主义”的批判和整风确实值得借鉴之外,其他时期即使有批评,也难免偏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才亦步亦趋地从邯郸学步蹒跚到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过河时,前面的石头就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走?因此,近年来部分态度严肃的知识分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与那些庸俗的趋炎附势者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组也加剧了。这就是所谓“新左派”、“新保守”、“中左”和“中右”等各种理论派别逐渐形成,并且纷纷从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老左派和跟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中分化出来的原因。

二、强调制度变迁,需要以史为鉴

要深刻认识当前全球化的问题,就有必要以史为鉴。

20世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类性质不同的政府,但这三种不同的政府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追求西方式的工业化;不过有的被迫,有的主动。

满清以列强为师的工业化失败了;接着是民国以英美为师,大局甫定即开始追求官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也失败了;再后来,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朝鲜战争硝烟未散,就开始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这次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当然不小^{*}。现在又提出以英美为师。看来人们真是有必要好好回顾一下20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否则搞不清楚现实。

满清19世纪末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时还不打算接受其话语体系,只想借助其个别“奇技淫巧”。可是19世

^{*} 本书收入的“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和收益’”(原载《99独白》第3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对所谓“代价”有详细分析。

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中国被人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甲午战争,日本人所得到的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共计 2.3 亿两白银,是它 4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是中国 17 年的海关税收。就等于说,即使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国 4 年。再加上 17 年中国政府没有关税收入,也就更没有能力投资于工业化。实际上,这一次战争就使日本在工业化上超前了中国 15~20 年。接着,1900 年的庚子事变又给八国联军 4.5 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满清政府约 38 年的关税收入)。前后两者相加与初步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就得落后 30~50 年,更何况西方那些早期工业化国家。

就是在这种“落后——挨打,越挨打——越落后”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发出“打倒孔家殿”的最后吼声,这既是迫于国势衰亡的无奈,又是客观上对民国建立初期为列强控制的军阀政府适应国际环境而重新结构话语体系的无奈。是的,中国人就这样被迫接受了西方话语体系,否则,中国怎么进步呢?

其实,在民国建立之前,由清朝政府推进的戊戌维新已经在强调兴修铁路、开通邮电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等教育体制改革。因此,如果我们不刻意重视朝代更替,就应该注意到那个时代清朝政府实际措施的采取以及随后的民国初期知识界“打倒孔家殿”、“实行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上,这两者不仅在原因是相连系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相类似的。那么,一百年前政府和知识分子这种“默契”递进的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过去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靠的是科考取仕制度,这个制度内含着非常重要的且具有双重功能的社会稳定机制。我不知道现在学校的历史课还讲不讲这种机制。一是断绝了这种科考取仕的晋升体制,意味着农村小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不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农民身份。没有科考,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就将和造反起家的农民(如鲁智深、李逵之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小知识分子的加入,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二是

封建皇帝利用科考制度可以建立起维护政权的“清道夫”队伍。你想，那些“锥刺骨”、“发悬梁”，“囊萤映雪”、“十年寒窗”的农民青年一旦考上了，满脑子就只剩下“圣贤之道”了。经过皇帝殿试，面对面地了解这种人“傻”的程度，赐给一柄上方宝剑，出去当“巡案”微服私访，其实就是做“中央调研员”。有群众告状，“傻”巡案调查属实，不管这个官员是否对发展地方经济有政绩，是否有皇亲国戚的背景，该罢免就罢免，该杀的就拔出上方宝剑。当然，如果巡案杀不了地方官员反而被人家干掉了，那也给了皇帝一个警告信号：这个地方已经“尾大不掉”了！皇帝就得借茬杀这个地方官员。于是，这个官员就可能“调京候旨”，弄得好给个虚职，如户部“员外郎”之类，差的就只能“候补”了，再派出特务盯梢密报，看京里谁跟他近乎。这些官员对大权旁落当然不满，吟诗作赋之间难免有所表现，于是也就有了“文字狱”之类的戏。这样，虽然有些冤假错案，但至少这个科举制度起到了为保皇权、反腐败、建立“清道夫”机制的作用。

如果可以与现代的“应试教育”作比较，人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在拔擢底层小知识分子的功能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没有反腐败、建立“清道夫”机制的作用罢了。

其次，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口岸后，连内河港口都强迫开放了。在这以前，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是靠广东九龙一个口岸出口的，需要成千上万的运输从业者，恰恰给那些贫苦的或者破产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那时很多帮会组织就是以这些脱离氏族传统村社控制的无助的农村游民（现在被报刊叫做“盲流”或“流动打工人口”）为基础组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村资源短缺，大量农民少地、无地，又属于低素质劳动力，至少当“脚夫”还能养家糊口，否则只能偷盗或为匪徒。而很多口岸的一下子开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劳动者失业。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这部分最有组织的行会性质的流氓无产阶级和不可能再改变自己命运的小知识分子有条件结合，造

反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20世纪初叶就是这种条件具备之后的农民革命端掉了满清王朝。

至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仅当时没有几个人了解,实践中也不断失败,不得不改变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动员旗帜。后来导致列强控制的军阀政府割据,并且在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打倒孔家殿”的激烈口号,则客观上起到了与西方话语体系接轨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考虑: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在本质上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弱势政府在被迫对外开放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过程中的崩溃。实际情况如上文:革命的主体是那些被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出路、不能再靠孔孟之道改变自己阶级地位和平民身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加上那些以流民为主体的最有组织的帮会。流民在多口通商后被断绝了生计,再加上旧中国军队相当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帮会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然后革命党利用帮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严密的封建性质的组织系统起事。孙中山的所谓“民主革命”无论理论上如何民主,实际上只能利用这两种势力。革命发生后军阀窃取权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则又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其实一百年来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可能成功。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华民族的悲剧性的近代历史。

三、在“两个 11 年”的实践中形成观点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导向宣传的都是些成功人士,好像现在的“大款”成为社会主流,老百姓要是不像他们那样好像就白活了似的?许多人做出各

种努力想成为“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是很痛苦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要么苦恼要么心烦。他们唱“我让青春闪了一下腰”，其实是让“现世”闪了一下腰。因为他们即便再怎么努力追求，也达不到饕餮趋向的舆论展示给他们的那种现代化生活，尤其是农村青年。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发展经济所依据的理论体系该怎样建立？这是很难简单答复的问题。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30年的国家垄断体制需求的，这套理论体系是非常牢固的。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影响，与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要想在两个不一致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毛泽东曾说过“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但目前作为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是很难考量的。

这样说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的思想形成于“两个11年”：从1968年插队开始到1979年考上大学之前，我曾有过11年的基层工农兵的生活经历；在1983年大学毕业后18年的政策调研经历中，又有11年是下基层搞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两个11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因为恰恰是长期基层实践经历终于把我这根毛安到普通老百姓那张皮上了。这种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从我收入本书的这些不断引起争议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1988年，在我自己开始形成思想的时候，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那是我第一次发出有影响的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应该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至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那年8月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即引来了很多的批评。因为那时候传统理论还占优势，因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不存在危机周期。尽管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的，但也

被认为是不对的。

1991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在80年代提出的观点,1992年回来后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等一系列引起讨论的文章,大多数是《中国软科学》、《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或《新华文摘》转载的。这些文章都明确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学术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可能是由于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于是已经西化的理论主流又有一些批评,因为那种否认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观点占多数。

这些不同的批评基本上是从不同的理论规范出发的,本来都是搞理论研究的人的立身之本,既然关系人家的饭碗,当然无可厚非。好在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1987~1998年这11年间,我下基层去搞社会科学“试验”。理论界从事规范研究的朋友观点不同可以互相对立,但无论什么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的观点。其原因大概也是我一向不从理论规范出发,多年来埋头基层,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我这个“试验员”所能够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如果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所形成的观点就是有深厚的本土化研究基础的。

进行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前人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再去验证它;另一种是试验法,即把某些观点、思想经过一个试验的过程来证明对错。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社会科学中法学、广告学、商品学都可以用试验方法,但它们都是一种小范围的对比组试验,比如,法学试验可以用一个“单面镜”来观察接受试验的对象。经济科学很少能够使用试验方法。

我们搞农村试验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意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试验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当然,这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从最基本的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开始,逐步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联系,才有可能形成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这样不厌其烦的工作,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把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

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人说,我们搞这种试验不过是为了验证政府的政策有多么正确,但官方搞试验是很难发现真问题和反映真情况的。其实这要看试验者本身,看从事具体项目的操作人员的敬业态度。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除了秉承上级的旨意来进行某种分析外,还是可以在试验中做很多科学研究工作的。我并不是标榜自己属于这样严肃的学者,但我确实在做这件事上一直是很认真的。进行试验中我得罪了不少人,也有些同事、朋友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试验结果,甚至有时候被领导批评。当今官场风气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按照经济学的“理性”,我们中有的人即使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这种坚持“报忧得忧”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因为即使得到些批评,也是有益于心智的。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我觉得心平气和。

我们这种试验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试验中得出的结果也不是只适用于农村。

例如,很多人相信中国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开始也抱着能搞的观点去试验,在这个领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政策上只能继续强调“稳定集体所有制”。因为,在试验进程中我们认识到农村不具备私有化的前提:由于政府不可能对9亿农村人口提

* 农村试验区是从1986~1987年开始的。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动员了10个省的农村政策部门,把一些关乎农村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转变成不同试验项目,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试验。不久就发展到14个省;11年后已经有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64个县市加入了试验区的行列。

供社会保障,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中国这种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了,那时农地也许有条件私有化了。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认识到: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来形成制度,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外,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均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其有限的、高度分散的剩余并不能完全被市场左右。再加上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都不合算,所以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越益有限。

可见,无论何种主体,如果直接与亿万小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会由于交易对象的数量巨大且分散,而每个交易额又细小,必然出现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问题。

总之,覆盖中国70%人口的这种小农经济对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形成的制约是根本性的。当然,也许谁有本事像欧洲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把矛盾转移出去。主张中国全面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人也许愿意考虑这样的前提:有一天,中国突然得到一个机会,要么占领某个比自己本土还大的“新大陆”,要么寄希望于彻底实现“市场自由”,通过劳动力市场“全球一体化”,把过剩劳动力连同其赡养人口一起迁移出去……。

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一个接一个,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这个分

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了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些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是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很多人对我的说法提出过质问,因为至少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远远高于日本。其实简单提出这种比例关系是有问题的:

第一,日本全国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显得很低,但实际上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3倍,因为日本的实际务农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而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所以说,拿一个国家的人口和耕地资源来比,日本比我们要低,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无论日本、印度耕地占国土面积都比我国高。中国尽管国土面积大,但按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来比,则远远低于它们。

第三,就是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日本、韩国都要数倍于中国。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即劳动力人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为828亩,而我国只有4亩多,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倍。这是绝对不可比的。虽然从矿产、海洋资源等方面来看,我国确实比有些发展中国家有优势,但惟独农业资源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土地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以及9亿农民依存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实际上只是派生的。所以,我一向强调“三农问题”,认为中国并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尽管人们常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的问题。所

* 参见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有的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其实“农业出问题”只是现象形态。记得大约在 1989 年前后,有人说农村改革超前了,因此要等解决了城市问题之后再重新发动。同时又在政策上只强调农业问题,甚至进一步把农业问题简单地强调为粮食问题,结果造成这 10 年来农村改革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了。经济是个有规律的过程,没有说谁要停下来等谁改革的问题。农村改革一旦停下来就会累积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农村累积的矛盾正在释放出来,它已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制约。

四、中国在 21 世纪面临三大“结构”问题

可以概括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最近 20 年的高增长又被人们承认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因此 21 世纪中国人的资源更短缺。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就是这样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

其实,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革命或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近年来大量暴露的矛盾已经让人们在教训中开始反思,因此,也许我们还有说服有关利益集团进行结构调整的机会和可能。

第一大问题是就业结构问题。

中国农业占 GDP 比重大约 15%,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 50%左右。这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上去:一方面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也就上不去,负担就重,与地方政府矛盾就出现对立趋势;另一方面农村资源短缺对流动人口的持续外推,出现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安定团